

纪念《新青年》创刊100周年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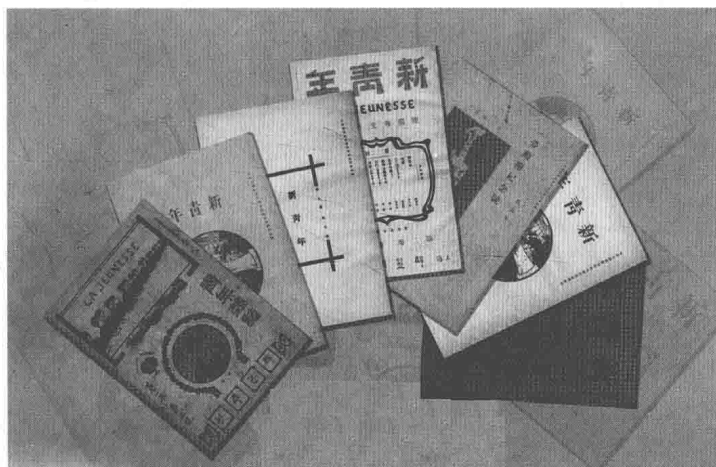
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纪念《新青年》创刊100周年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纪念《新青年》创刊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鲁迅纪念馆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520-1226-2

I. ①纪… II. ①上… III. ①期刊-新闻事业史-中国-民国-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G219.29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6719 号

纪念《新青年》创刊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

责任编辑:章斯睿

封面设计:李 荣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照 排: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颀辉印刷厂

开 本: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15.25

插 页:1

字 数:380 千字

版 次: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1226-2/G · 465

定价:4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主 编：郑 亚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晓东 邓 军 乐 融 乔丽华

李 浩 吴美华 郑 亚 施晓燕

顾音海 秦海琦 高方英

责任编辑：李 浩

封面设计：李 荣

摄 影：朱圣斌



“纪念《新青年》创刊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代表合影 (2015.9)

目 录

“常识”的澄明与普及 郜元宝(1)

瘠土上的播种者

——《新青年》创刊 100 年 陈漱渝(7)

再谈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问题 王锡荣(25)

作为追求诗与美之气质的鲁迅

——浅议《新青年》中鲁迅新诗与杂文之诗人

气质 孙玉石(41)

文化样态:《新青年》封面与插图的考察 杨剑龙(55)

中国文学发展的新起点

——《新青年》与民国文学新潮的兴起 黄 健(66)

“五四”新文化运动断想 黄乔生(81)

鲁迅与“五四”的相遇

——兼及纪念《新青年》在当下的意义 汪卫东(93)

《新青年》在历史上的真正功绩何在 哈九增(104)

《新青年》的创刊及北上南归 乐 融(112)

“订孔”的延续:从章太炎到陈独秀 贾泉林(124)

“寂寞”“听将令”和“曲笔”

——《新青年》视野中的《狂人日记》 鲍国华(138)

致广大而尽精微

——基于《新青年》语境下的《狂人日记》细读

.....	靳新来(146)
鲁迅小说《风波》阅读史	
——以民国时期为考察重点	乔丽华(158)
新论鲁迅与《莽原》	黄恩恩(174)
鲁迅《新青年》时期随感录的当代性	顾红亚(202)
《新青年》·《狂人日记》·鲁迅	吴长华(209)
《新青年》“文化场”中的作家鲁迅	卓光平(217)
鲁迅·胡风·《新青年》——鲁迅“五四”传统与 胡风的传承	蔡洞峰(233)
从《钱玄同日记》看《新青年》时期钱氏对鲁迅的 影响	施晓燕(252)
李大钊与《新青年》	刘晓艳(268)
瞿秋白与《新青年》	王 洁(291)
新时代的参与者:《新青年》与商务印书馆	韩 晶(304)
《新青年》与熊佛西对中国现代话剧诞生的开创性 贡献	曹树钧(316)
《新青年》呈现的社会教育一瞥	高方英(326)
从独人到同人	
——早期《新青年》的渐变过程	吴 凡 陶渊骏(335)
《新青年》以及后继者之一《语丝》	
——两种同人杂志中的鲁迅	李 浩(348)
鲁迅的诞生	
——论鲁迅与《新青年》的关系	曾子炳(362)
《新青年》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冯志阳(393)

鲁迅与沈尹默早期学书路径之比较 孙晓涛(421)

新文化运动背景下传统学术的转型

——以博物学及博物馆兴起为例 顾音海(450)

新文化语境下的文艺观

——鲁迅、邵洵美《北平笺谱》编印之争及其他

..... 邵文菁(461)

编后 (477)

“常识”的澄明与普及

郅元宝(复旦大学)

1915年9月15日问世于上海的《青年杂志》月刊距今100周年了。该刊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时改名为《新青年》，从此直到1926年7月停刊，再未更换名称。习惯上称《青年杂志》为《新青年》前身，两者名称不同，实为同一份刊物。众所周知，《新青年》创刊是新文化运动发端的主要标志，《新青年》杂志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从1920年9月第八卷第一号起，它又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机关刊物，1923年6月改为季刊，更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纪念《新青年》创刊100周年，不仅是纪念新文化运动100周年，也是纪念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意义重大，不言而喻。

对上海来说，纪念活动有其特殊意义。《青年杂志》创刊于上海，1917年初编辑部迁到北京，1920年上半年又回上海。从创刊算起，在北京3年多，在上海8年多。不算1922年7月休刊至1923年6月改为季刊重新印行，也有7年多，超过在北京的时间一倍以上。《新青年》始于上海，终于上海，印刷发行地也始终在上海，和上海有不解之缘。

对上海鲁迅纪念馆来说，纪念《新青年》创刊100周年，更有一层意义，就是中国新文学之父鲁迅先生乃是从《新青年》杂志起家。“鲁迅”这个笔名是1918年5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时首次使用的。鲁迅没有正式列名《新青年》编委会，但他

是《新青年》核心赞助者之一,参与了许多围绕编辑方针的关键性讨论。更重要的是,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杂文随感和白话小说,是《新青年》当之无愧的核心作者和灵魂人物。《新青年》成就了鲁迅,鲁迅也为《新青年》作出了卓越贡献。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将《新青年》这本原来只注重“议论”的刊物变成“议论”和“创作”并重乃至互相渗透相得益彰的刊物,使全国的读者在这本倡导“文学革命”的刊物上看到了“文学革命”的“实绩”。没有《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风波》《故乡》这些石破天惊的小说,《新青年》很长一段时间恐怕只能收获一些关于“文学革命”的“议论”,以及几首稚嫩的白话诗,几篇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而拿不出“文学革命”的像样的成绩。若果真如此,则那时的中国文坛将何等“寂寞”,《新青年》也真的成了几个勇猛的闯将在沙漠里没有回声的呐喊了。

所以,由上海鲁迅纪念馆举办纪念《新青年》创刊 100 周年的学术活动,将上海和鲁迅这两个与《新青年》至关重要的元素结合起来,确是再恰当不过了。鲁迅与《新青年》乃至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一直受到人们关注,但有待进一步研究的空间仍然很大,许多认识至今还停留在人云亦云似是而非的水平,期待这次纪念活动能够促进这个问题的研究更上一个台阶。

早在 2014 年下半年,国内外一些学术机构和文化单位就开始了纪念性的学术活动。2015 年一开年,各种纪念活动连续不断,8、9 月份达到高潮。这些纪念活动的核心课题,就是重新肯定和追怀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以《新青年》为阵地所推动的那场试图改变中国文化基本走向的新文化运动。具体地说,就是在《新青年》杂志上发动“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提倡“以白话代文言”,介绍各种世界性的“新思潮”,堂堂正正打出“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旗帜,直至以《新青年》为思想库引发“五四”青年爱国运动,全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从此更加严肃而科学地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这一切在几千年中

国文化史上都绝无仅有，至今思之，犹不能不令人为之神往，以为先贤们确有常人所不可及者。1949年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在他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轴心时代”的理论，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大概在北纬30度上下，古希腊、古印度、古希伯来和古代中国文明同时发生了重大突破，产生了各自的精神导师，并基本塑造了各自的文化性格。有人称新文化运动是继晚周“百家争鸣”之后中国文化史上第二个“轴心时代”，不是没有道理。只不过新文化运动毕竟才开展100年，它作为未来数百年或数千年中国文化另一个伟大开端的意义，由我们今天的人来下定论还为时过早，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今天的人也有未来关心历史的人所没有的优势，就是我们毕竟“去古未远”，毕竟还能相对真切地感知100年前那场文化革命所散发的巨大热力，由今人谈《新青年》，谈新文化运动，还不是纯粹的“知识考古”。

当然，就像许多纪念活动一样，围绕《新青年》创刊而展开的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活动也引发了一些议论甚至疑惑。许多人追问：《新青年》这本杂志果真那么重要？新文化运动的意义究竟何在？《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到底留给后人怎样一笔精神文化的遗产？

其实100年来，这个问题早就有了答案，那就是以《新青年》创刊为发端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开启了现代中国文化的闸门，我们今天仍然航行在从这个闸门涌出的新文化河流之上，今后还将继续在这条河流上航行。新文化之所以被冠以“新”的名，因为它真正实现了数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它不是这个传统的“孝子贤孙”，因为它在许多方面都勇敢地批判和扬弃了这个传统；但它也绝非这个传统的“不肖子孙”——恰恰因为有了新文化运动，国人才真正开始用近代科学和民主的理念与方法来研究和思索传统，将传统这艘“古船”毅然驶入世界进步文明的洪流中

去,从而使它焕发生机,获得了崭新生命。

100 年来,这个答案经过无数社会文化实践的检验,和许多规模不等的文化论争,逐渐成为普遍认可的常识,积淀在现代中国人的记忆深处。

但是,所谓“常识非真知”,有时指一种常识遭遇了新的实践的 challenge,不得不暂时放下它作为“真知”的冠冕,接受新时代新问题的挑战。但有时,所谓“常识非真知”,乃是指一个时代和一个社会遗忘了作为“常识”的“真知”,“缺乏常识”,甚至悍然蔑视“真知”。

近来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疑惑,恐怕上述两种情况都有。

若是第一种情况,那么凡赞同新文化运动的人就不得不起来认真严肃地应对新的社会文化实践的挑战,以阐明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意义和正面价值究竟何在。许多纪念文章都抓住这个问题而展开。不妨将这样的纪念当作新文化运动一系列价值公设与当下中国社会文化实践的一次积极对话。比如,当下中国一些价值失范和失序现象是否可以归罪于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有没有抓住当时世界的进步文化?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的批判哪些地方是对的,哪些地方今天看来尚有可疑和可议之处?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批判是否过于偏激,导致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断裂,还是不够彻底,以至于传统的许多污泥浊水至今仍到处散发着害人的毒气?新文化运动是“五四”一辈人所期待的“中国的文艺复兴”,类似欧洲近世那场伟大的复兴运动,还是中国文化的一场浩劫,如当时许多反对者们所指责的那样?新文化运动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谈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所说的,“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抑或仅仅昙花一现,“只生野草,不生乔木”,很快改弦易辙,背离了新文化运动主将们的初衷?新文化运动主将们的初衷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

这里不能一一展开讨论围绕新文化运动的上述种种疑惑,但

可以肯定,在这场百年一遇的对话中,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意义、或它的有偏执、它的未竟之业,作为一种常识,必将随着当下中国社会文化实践的问题一起获得进一步澄明。这是历史和现实对话给后人带来的莫大的好处,也可以说是历史透过现实而赠予后人的一种额外惊喜。

但若是后一种情况,即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意义作为一种文化史常识已经被今天的人们普遍淡忘,那么纪念《新青年》创刊和新文化运动 100 周年,就是一个很好的普及“常识”的机会。

常识的普及并非易事,不可能像推销商品那样简单,必然也会有激烈的思想交锋与碰撞。有时候愈是常识就愈不易为人们所接受。鲁迅在一篇题为《水性》的短小睿智的杂文中说,几千年过去了,许多人还不懂水性,还不具备关于水的基本常识,只知道它温柔可爱,不知道它也有致命的危险性,“最要紧的是要知道水有能淹死不会游泳的人的性质,并且还要牢牢的记住!”但他又说,“现在还要主张宣传这样的常识,看起来好像发疯……但事实却证明着断断不如此。许多事是不能为了讨前进的批评家喜欢,一味闭了眼睛作豪语的。”宣传“常识”,有时竟会被人们视为“发疯”。为什么?因为好作“豪语”的人害怕“常识”。一旦人们尊重“常识”,他们推销的那些美妙无比的“豪语”就不值一文钱了。不仅不值一文钱,还会被大家轻易看出那其实才是真正的“发疯”。鲁迅一再强调,与“常识”相比,我们其实更喜欢各种“中国的奇想”,更喜欢竖起耳朵收听和传播各种奇谈怪论。这也是不易克服的一种国民性吧,如今网络发达,微信普及,“常识”和“中国的奇想”的斗争不是愈演愈烈了吗?

“五四”先贤们在推动“重估一切价值”的“新思潮”时并不显得如何高深莫测,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向国人普及关于新文化与旧文化、新道德与旧道德、中国与世界的类似“二五得十、五五二十五”的基本常识。胡适说,做白话文的秘诀是“有什么话,说什么

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对志存高远的文学创作来说也许过于浅白了点,但要切实做到,也殊非易事。我们现在每天看到的,恰恰是与之相反的现象横行天下。有什么话,偏偏不说。明明无话可说,却偏偏像念咒一样说个不停。许多话,简简单单就能说明白,却偏不肯那样,偏要拗断脖子说得天花乱坠,令人不知所云。周作人也反复强调,他的理想无非“国文粗通,常识略具”。鲁迅、胡适、周作人这些话并非故作谦虚,而是深知“常识”的重要和“常识”的不受欢迎的卓见之言。

先贤们为了普及“常识”,为了“启蒙”,殚精竭虑,强聒不舍。今天,即使要普及有关他们当年所作所为的一些“常识”,也得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大道妙要,固然可敬可畏,但历史反复告诉我们,最难避免、后果最严重的往往还是常识性错误。“五四”诸公深知此理,所以他们的思想何等直接爽快,清静明澈,他们的文字又是何等明白如话,辞若对面。相比之下,我们今天的学术艺文乃至报纸杂志上普通的应用之文似乎一律必须高深莫测不可,殊不知其实已经深深陷入了“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故作高深,严重缺乏常识,甚至害怕常识的“发疯”的地步。

普及“常识”,任重道远。

总之,在纪念《新青年》创刊和新文化运动 100 周年之际,有两种情况值得认真对待。要么是“常识”遇到新问题的挑战,需要展开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来澄清“常识”的正误;要么是普遍遗忘“常识”,任由各种“中国的奇想”铺天盖地而来,黑白颠倒,谬论公行,因此亟须普及“常识”。不管哪一种情况,这场百年一遇的纪念活动都不会完全是应景的,更不应该真的变成“为了忘却的纪念”。

2015 年 8 月 25 日

(本文是 2015 年 9 月 20 日作者在上海鲁迅纪念馆举办的“纪念《新青年》(《青年杂志》)杂志创刊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

瘠土上的播种者

——《新青年》创刊 100 年

陈漱渝(北京鲁迅博物馆)

一、《新青年》的基本价值观

有一种刊物,开风气之先,一个世纪以来,对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持续影响,这在出版史上十分罕见。这个刊物就叫《新青年》。

《新青年》杂志原名《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创刊,1916年9月改名《新青年》,至1926年7月25日终刊,历时10年10个月零10天。其间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一,上海初创阶段:由陈独秀主编主撰,作者大多是皖籍人士或陈独秀友人,因销路不畅,于1917年8月出完第三卷后停刊。二,北京复活阶段:1917年1月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1月重新出版《新青年》,因为北京大学一批知名教授加盟,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改为同人杂志,致力于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发行量增至1.5~1.6万册。三,过渡阶段:1920年1月,被北洋政府拘禁了98天的陈独秀离京南下,于1月29日抵达上海。《新青年》第七、八、九卷因此改在上海、广州出版,刊物重新由陈独秀主编,并逐渐过渡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管控。因为政治理念和办刊宗旨不同,《新青年》南北同人间产生了分化。第四阶段为转变阶段,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改为季刊复刊,由以新文化运动为中心的刊物完全变

成了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现在学界评述的《新青年》，一般是指前三个阶段的《新青年》。

《新青年》宣传的主要价值观是什么？陈独秀在《本志罪案答辩书》中说得明明白白：“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要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¹由此可见，要不要民主和科学，是《新青年》阵营与其敌对营垒较量的中心问题。

但是，近年来有一种新论，认为民主与科学不是《新青年》的基本价值观，也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其论据是：1999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张《新青年》光盘，经检索，在总字数超过 541 万字的《新青年》杂志中，“民主”系列主题词的出现频度极低。《新青年》总计发表各类文章 1 529 篇，其专门讨论“民主”的文章只有 3 篇，论及科学的文章也不过五六篇。提出这种新论的人还无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蒋介石独裁等基本历史事实，说什么“正因为民主与科学的威权在中国早已确立，在无人挑战其威权的情况下，《新青年》甚少讨论民主与科学，自在情理之中。”²在我看来，这些新论通通不能成立。

首先，我们承认，设定关键词的确给学术论文检索带来了便捷，然而仅仅依据关键词来得出学术结论则难免失之毫厘，谬之千里。譬如“民主”，既是一种价值观念，也是一种行为方式和制度规则。这种观念和准则体现在方方面面，不仅关系到社会生活，而且关系到家庭生活，“Democracy”一词传入中国后，先后有 8 种译法：即民众主义、民权主义、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平民主义、惟民主

义、民治主义、庶民主义。陈独秀的文章表述得十分清楚,《新青年》杂志发表那些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的文章,就是为了反对专制,拥护民主。所以决不能单纯根据“民主”一词的出现频率来判断《新青年》宣传民主观念的深度和广度。同样是用电脑检索 300 万汉字用量的《鲁迅全集》,“民主”这个词汇一次也没出现,我们难道就能够据此判定鲁迅毫无民主意识吗?

再说,认为“民主”与“科学”不是《新青年》的基本价值观也与刊物的实际不符。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发表的《敬告青年》相当于代发刊词。这篇文章一开始就鲜明地树起了“民主”与“科学”这两面旗帜。陈独秀理解的民主并不是什么多党制,而主要是人权。他认为,人各有自主之权,而绝无奴隶他人之权。一部近代欧洲史可以称之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是为了谋求政治解放,否认教权是为了谋求政治解放,所有制变革是为了谋求经济解放,……所谓“解放”就是挣脱奴隶羁绊,争取自由自主的人格。概括起来,陈独秀民主思想有三个重要内容:一,法律上的平等人权;二,伦理上的独立人格;三,学术上的破除迷信,思想自由。陈独秀之所以激烈抨击孔教,是因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的历史因缘,又成为了辛亥革命之后封建复辟派的思想武器。定“孔教”为国教违反了思想自由原则,也违反了宗教信仰自由原则,不能适应现代生活的需求。他之所以激烈抨击纲常伦理,因为纲常等级制与共和立宪制水火不相容。如果一个社会,君虐臣、父虐子、姑虐媳、主虐奴、长虐幼,那还有什么民主自由可言?由此可见,陈独秀对旧伦理、旧文化的看法,都是他民主观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把民主政治的实现寄希望于民众,而不是少数杰出人物的恩赐,其中已闪耀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芒。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陈独秀在介绍法国大革命的同时,还介绍了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学说,强调保护工人利益,抑制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这些都体现了作为具有初步共产